

17815.5
60

GUOJI WEIJI GUANLI

YU XINXI GOUTONG

本书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利用美国和苏联解密的外交文件，从国际体系、国家危机决策体制和决策结
个人三个层次，对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因素以及充分有效的信息沟通在化解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重要
作用进行了分析。对于中国加强国际危机决策和管理领域的研究，提高国际危机管理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危机决策体制和危机应对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际危机管理与 信息沟通

• 郑伟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基金资助

国际危机管理与 信息沟通

郑 伟/著



郑伟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郑伟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80211 - 983 - 3

I. 国…

II. 郑…

III. 国际问题 - 紧急事件 - 对策 - 研究 - 世界

IV. 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3311 号

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

出版人 和 龚

责任编辑 文 莲

责任印制 尹 琦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233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一、研究目的	1
二、研究方法	2
三、研究现状	3
四、研究重点	10

第一章 国际危机管理与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信息沟通

第一节 国际危机与国际危机管理	13
一、国际危机定义和特点	13
(一) 西方学术界的国际危机定义	13
(二) 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危机定义	15
(三) 国际危机的特点	18
二、国际危机管理定义和原则	19
(一) 国际危机管理定义	19
(二) 国际危机管理的原则	21
第二节 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	23
一、信息和信息沟通	24

(一) 信息	24
(二) 信息沟通	25
二、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	26
(一) 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的定义	26
(二) 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意义和作用	27
三、国际危机管理对信息沟通的要求	29
(一) 准确解读信息	29
(二) 明确、及时传递信息	32
第三节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信息沟通	36
一、危机前的信息沟通	36
(一) 苏联的部署行动	37
(二) 美国对苏联行动的关注	40
(三) 苏联的错误信息传递	42
二、危机中的信息沟通	48
三、危机后的信息沟通	65
小结	67

第二章 美苏危机的根源与信息沟通

第一节 国际危机产生的根源	68
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	69
二、冷战中美苏信息沟通的特点	70
第二节 美苏危机产生的根源	72
一、冷战初期美苏的对抗及特点	72
二、美苏在古巴和柏林的对抗	80
(一) 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与古巴革命	81
(二) 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关系	86
第三节 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	88
一、核武器与美苏冷战	88

(一) 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	89
(二) 核武器与国际危机	92
二、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	94
第四节 威慑与信息沟通	96
一、威慑与核威慑	97
(一) 威慑	97
(二) 威慑与信息沟通	102
(三) 核威慑	104
二、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威慑、核威慑与信息沟通	108
(一) 美苏之间的相互威慑	108
(二) 美国的威慑政策	110
(三) 危机中的核威慑	111
小结	112

第三章 美苏危机决策体制与信息传递

第一节 决策体制	114
一、决策与决策体制	114
(一) 决策	114
(二) 决策体制	115
二、决策体制与决策理论模式	117
(一) 组织官僚模式	117
(二) 小集团思维模式	118
(三) 政府政治学模式	121
第二节 美国危机决策机制	123
一、美国决策系统及其信息沟通模式	124
二、美国外交决策机构	125
三、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执委会”	127
四、美国的情报机构	132

五、美国危机决策体制	136
第三节 苏联危机决策体制	138
一、苏联外交决策机构	138
二、赫鲁晓夫部署导弹的动机	143
三、苏联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	146
四、苏联的情报机构与苏联决策体制	148
小结	153

第四章 决策者与信息沟通

第一节 影响决策者处理信息的有关因素	155
一、决策者的认知	155
二、决策者的“意象”	158
三、决策者的个性和信仰	159
四、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	164
五、决策者的“愿望思维”	167
六、决策者的“历史学习”和“历史类比”	168
(一) 肯尼迪的“历史学习”和“历史类比”	170
(二) 赫鲁晓夫的“历史学习”和“历史类比”	172
(三) “历史学习”和“历史类比”的缺陷	178
第二节 古巴导弹危机中决策者之间的信息沟通	180
一、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通信往来	180
二、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三次会晤	185
三、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危机中的信件往来	189
四、其他危机参与者的信息沟通作用	190
小结	195

第五章 总结

第一节 古巴导弹危机启示	197
第二节 结论	203
附录：古巴导弹危机中各方通信	209
参考文献	249

绪 论

一、研究目的

本书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研究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分析影响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因素。

一提到古巴导弹危机，学界会有以下普遍感觉：美国学者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成果太多了，并且认为，发生在冷战中的这一场国际性危机是一个“特例”，很难想象人类会再次面临这样一场几乎会有灭顶之灾的国际危机。

但是，正是因为这场危机是特别的，才更值得人们深思；同时，美国学者们的研究不能代替中国学者的思考，汗牛充栋的美国研究成果并不表示就没有了研究的必要。无论从理论还是历史的研究视角，都有必要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研究，以加深国内对国际危机和相关危机管理领域的研究，建构中国自己的国际危机管理体制。

可从信息沟通的角度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尽可能利用美国及苏联新近解密的档案文件，通过对危机前、危机过程中以及危机后各方的沟通情况进行详细分析，来分析国际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的作用。通过研究影响信息沟通的诸多因素，如国际行为体的对抗性特征、不同的国家决策体制和决策者等，指出在国际危机处理过程中，国际行为体的对抗性特征、国家决策体制和决策者等因素对信息沟通的影响呈减弱的趋势。

研究古巴导弹危机的价值在于：

1. 古巴导弹危机是公认的冷战期间美苏对抗中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国

际危机，是国际危机管理的典型案例，相对于美国广泛深入的研究而言，中国国内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危机期间信息沟通在危机处理中所起的作用，国外没有专门的论著出现，国内学者尚没有研究。

2. 美国的危机决策体制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中确立起来的，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美国的危机决策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信息沟通，可以让我们对美国的危机决策体制有深刻的认识。

3. 冷战是美国与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既互相对抗、又彼此妥协的历史，对抗和妥协的目标都是围绕核心国家利益之一：避免直接的战争。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对抗与妥协的典型事件，是最有可能导致战争、但又在关键时刻避免了战争的国际危机。尽管冷战时代已经远去，但是冷战研究仍很有价值。考虑到 21 世纪仍然是“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战略发展“机遇期”与危机高发期并存的过程，因此，中国学者理应进行自己的深入研究，而本人的研究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信息沟通有以下可行性：1. 从档案文件的角度看，古巴导弹危机是目前我们最有可能窥其全貌的国际危机，几乎全部的文献资料均已解密，包括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往来通信以及肯尼迪政府整个决策过程的录音资料等；2. 从信息沟通的角度，以历史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是我们认识现在、把握未来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危机决策理论和信息沟通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有一定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针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危机决策理论，无论用一种理论还是整合各种理论，都可以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解释。如威慑理论试图解释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和苏联双方针对得到的各种信息展开的激烈讨价还价过程；博弈理论与囚徒困境试图解释危机双方妥协与让步的原因；理性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试图从不同

的理论角度解释不同的问题；心理认知模式则从微观的角度，研究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对彼此的“意象”和“感觉”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等。但是，以上理论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同时存在，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完全的说服力。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中的定性研究，主要针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的信息沟通，属于历史个案的文献分析研究方法。通过综合运用国际危机管理的有关理论，特别是与信息沟通有关的决策理论，以及认知心理学中有关的概念，在使用美国及苏联有关的档案文件的基础上，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分析，探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问题。

之所以用历史个案的文献分析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于国际危机管理研究是“微观的国际政治”，而国际危机管理研究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是“微观”的问题，通过具体的危机个案分析，可以了解危机各方信息沟通的过程，发现信息沟通中的问题，总结信息有效沟通的经验。

信息沟通是国家间互动、决策者间互动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结果，因此，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些概念，如意象、知觉、错觉、愿望思维、认知取向以及借助历史学习、历史类比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信息是如何产生、如何传递以及如何被解读的。

三、研究现状

(一) 国外的研究状况

国外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美国的研究，用汗牛充栋形容绝不为过，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出现了一系列经典性的著作。下面从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简要介绍。

1. 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

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决策理论的角度），以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经典著作《决策的实质》为代表。^① 该书出版于1971年，对古巴

^①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Second Edition,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9.

导弹危机中美苏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危机决策的典型理论模式。除传统的理性模式外，还提出了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模式和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模式。

艾利森认为，在组织行为模式中，国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者，外交政策不是有目的的行为选择，而是由众多松散的组织之间，根据不同的日常工作程序操作的结果。例如，美国从发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嫌疑，到正式派出飞机来证实这一嫌疑，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每一个部门必须按照其标准工作程序，逐级地把信息报上去，最后由最高层作出决定，然后采取行动，派出 U-2 飞机侦察。官僚政治模式则强调，美国政府的不同机构之间存在分歧，如海军和空军、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争权夺利，对美国处理古巴导弹危机造成了影响。艾利森提出，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由于组织和官僚政治层面的因素以及沟通和交流的失败，理性受到了限制。

艾利森提出的决策理论的三种模式，是对外交决策理论的重大贡献，但对艾利森决策理论的批评也一直不断。如乔纳森·本德（Jonathan Bendor）和托马斯·哈蒙德（Thomas H. Hammond）认为，理性模式“就像一个会被别人轻易击倒的稻草人”，“国家不能被仅仅看做是一个拥有充分信息并追求单一目标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①而戴维·韦尔奇认为，“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的某些解释与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事实不符”。因为，一方面，组织惯例如搜集和分析情报，对发现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为了国家利益而寻求防止危机升级的过程中，决策者们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惯例的能力和愿望，大大增加了成功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对他们的影响要小于其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如他们的态度、性情以及价值观。”^②

^① Jonathan Bendor, and Thomas H. Hammond, “Rethinking Allision's Model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Jun. , 1992, pp. 301 – 322.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6—617 页。

艾利森和泽利科（Philip Zelikow）对《决策的实质》进行了修改，第二版于1999年出版。该书在修正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以上三种决策理论模式。先从理性行为体模型开始，并运用摩根索、谢林、凯南、沃尔兹、基辛格、布伊诺·门斯奎塔以及拉尔门等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来支持这些理论模式。^①

2. 历史研究的角度

美国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巴导弹危机作了大量的历史描述，他们关注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哪些人提出了哪些方案，当时苏联的动机和赫鲁晓夫的情绪是如何被解释的，人们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的不同估计，等等。^②

美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研究集中于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苏联为什么要把导弹部署在古巴？第二，为什么美国采取封锁行动？第三，为什么苏联撤出了导弹？

詹姆斯·内森（James A. Nathan）于1992年出版了论文集《重评古巴导弹危机》。该书包括8篇论文，是根据过去5年来新公布的文件、录音等材料写成的。其中一个新的结论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比过去人们所知道的更理智、更具妥协性。^③

1992年，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罗伯特·汤普森的专著《十月的导弹：被公开的肯尼迪与古巴导弹危机的历史》，该书引用了新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其中一个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1962年10月在U-2飞机侦察到苏联的导弹之前，肯尼迪已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了进攻性导弹。

1993年美国潘西奥著作出版社出版了詹姆士·希莱特、布鲁斯·阿林和戴维·韦尔什合写的著作《处在边缘的古巴：卡斯特罗，导弹危

①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14页。

② 同上书，第629页。

③ James A. Nath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机，与苏联的崩溃》。该书指出，1992年1月在哈瓦那举行的关于导弹危机的国际讨论会上，卡斯特罗承认他当时已准备进行一场战争，即使是一场核战争。

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和管理原则是从古巴导弹危机开始建立的，并将这些理论和原则运用于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本文将在第二章中详细介绍。

与美国不计其数的研究成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学者研究成果相对很少。目前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苏联具体有哪些学术研究以及研究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一些回忆录可以让我们对当时苏联的决策与美国进行比较，如安纳托利·葛罗米柯（危机时苏联外交部长的儿子）的著作《俄国人眼中的肯尼迪政府的1036天》，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儿子的著作《导弹与危机》等。

（二）中国的研究状况

1. 国际危机管理的角度

目前国内学者对国际危机以及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布一些研究性和介绍性的文章。如赵绪生的文章《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与危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际危机及危机管理理论研究。作者鉴于冷战前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冷战后时期国际政治危机的概念、新特性、国际危机的成因及国际危机管理的新特征进行了理论的新界定和概括，形成了对冷战时期国际危机的理论的新发展。

作者认为，国际危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际冲突，是国际冲突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国际关系发展到一种临界状态。如果这种状态得不到有效的管理，那么国际危机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就是爆发国际战争或者导致国际体系发生质的变化。国际危机的主体是国家行为体；其实质是国际体系在短期内出现的一种失衡状态，是国家之间冲突关系的发展处于质变的临界点；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由既有国际平衡的破坏引发的地区动荡与冲突；冷战后国际危机呈现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的重要新特性，为浓厚的经济性。

对于冷战后国际危机形成的原因，可概括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国

际政治格局在新旧更替过程中出现了“诸侯割据”的发展趋势。其二，一国因民族、宗教、自治问题引起的国内危机或者国内战争，其较强的外溢性带来了地区范围内的连锁反应，造成地区性的国际危机，即国际政治学上所谓的“内战国际化”。其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由一国经济政治危机扩散所导致的地区政治经济集团成员国之间的“连锁危机”。其四，由高技术武器扩散的国家以及谋求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引起危机。其五，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世界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的边缘群体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反抗和破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各种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其中，由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所导致的国家间危机最具代表性。最后，由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没有解决的领土争端、民族纠纷或者宗教矛盾等问题在后冷战时期的条件下进一步恶化而引发国际危机。

文中概括了后冷战时期危机管理较冷战前所具有的新特性。首先，后冷战时期危机管理的主体特性表现在参与危机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和主体地位与作用的变化；其次，后冷战时期的危机管理目标与救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三，以由第三方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或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干预使危机得到缓和与解决成为危机管理的主要方式。第四，单边管理减少而多边合作集体管理增加是后冷战时期危机管理方式上的重要特性。^①

邱美荣的文章《国际危机研究述评》从危机、危机管理以及危机决策等不同层面对国内外的国际危机研究现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②文章指出，就危机层面而言，它涉及危机概念，危机与世界政治中的冲突、战争等现象的联系及区别，危机起因以及危机发展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在危机管理/处理层面，涉及危机预警和危机管理两方面，前者包含危

① 《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

② 《欧洲研究》，2003年第6期。

机预警及预警失败的原因等，后者包含危机管理的概念、危机管理的角色、管理手段以及核时代的危机管理等方面；从危机决策层面来看，则涉及危机决策的概念、分析框架、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大国的决策研究以及决策模式等方面。

2. 历史研究的角度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性的历史描述，如 1997 李德福的《千钧一发：古巴导弹危机纪实》从历史的角度对古巴导弹危机进行了研究；杨存堂编著的《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利用苏联解密的档案对危机过程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朱明权主编的《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关系》、刘金质的著作《冷战史》各有一章介绍古巴导弹危机；资中筠著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和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 9 卷中也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张小明著的《冷战及其遗产》把古巴导弹危机作为个案进行了研究，《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度对古巴导弹危机作了介绍。

另外，国内最近几年发表了一些介绍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章，如桂立的《古巴导弹危机决策研究》^①、韩洪文的《美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初步反应》^②、《论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果》^③、张小明的《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④、郝承敦的《古巴导弹危机新论——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政局的分析》^⑤、曹英伟、付佐民的《古巴导弹危机与“隔离”政策》^⑥。赵艳的文章《近年学术界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述评》^⑦ 对以上文章的研究成果从古巴导弹危机的缘起和性质、美苏决策、后果和影响教训、

① 《武汉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② 《军事历史》，1997 年第 5 期。

③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 5 期。

④ 《世界历史》，1996 年第 5 期。

⑤ 《拉丁美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⑥ 《理论观察》，1996 年第 1 期。

⑦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 年第 6 期。

谁赢得了危机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述评。

学者荣正通、胡礼忠在《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一文中，对古巴导弹危机管理中“有限理性”作用予以了详细分析。该文指出，国际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并不都是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决策者个人认知的有限性、国际权力政治、国内官僚政治的影响以及各种偶发因素都是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有限理性”特征。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危机决策和处理受到了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的双重影响，充分体现了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中的“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如有限危机升级策略或战争边缘（brinkmanship）策略实施，美国空军、海军、陆军和中央情报局等各自的部门利益及其行动倾向和方式的不完全一致都体现了古巴导弹危机管理的“有限”。但“理性”最终也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肯尼迪顶住了来自内外部的压力，坚持对苏联软硬兼施，“理性”在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此，作者认为，“有限理性”在危机和平解决中作用明显。在危机期间，由于“有限理性”的“有限”，使得危机不断激化，一度有转化成战争乃至全面核战争的危险，但也正是由于“有限理性”的“理性”，使得双方的决策者都意识到局势随时都可能因为意外因素而失控，因此被迫在最后时刻选择彼此妥协来和平地解决危机。在“有限理性”的指引下，国际危机管理的结果至少将满足双方的最低要求，使双方的利益都得到相对的最大化，即获得的利益最大化或损失的利益最小化。^①

学者郭学堂在《国际危机管理与决策模式分析》一文中对冷战后国际危机管理的现实作了进一步分析，概括了冷战后国际危机管理过程中所新面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尤为明显的是，国际危机主体多元性与危机管理主体独立性；国际危机的突发性和危险性、危机管理决策机制的可行性之间以及国际危机的扩散性与决策过程的集中性之间的对抗

^① 《国际论坛》，2007年1月第9卷第1期。